

1982年11月13日 翰老谈话记录稿

我的四个朋友。

一、高仁山

1920年我在美国大学毕业，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，碰到了高仁山。他是江阴人，南开学生，曾在日本勤工俭学。他是组织《新中学会》的发起人（大概两年前的文史资料记载了周恩来、顾淑型和我的名字）。我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搞美国宪法史，当时高仁山也是勤工俭学，自费。我有奖学金，他没有。我搞历史，他搞教育。

从天津南开毕业后，他到日本，周总理也在日本，所以他们就发起组织《新中学^学会》。

高仁山为人很直爽，我有缺点他当面批评我。我们都爱谈。我们在一起讨论国家问题，中国国内情况，共同认为不改学不得了。我们受日本欺侮，将来要被日本研究的。我们怎么办？高讲利，在日本，天津都有《新中学会》的人。当时在美国有《新中学会》分会，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就有好几个人参加，解放时山东人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就在研究院。《新中学^学会》的会员都是朋友，回国要干（救国的意思）。

高认为美国教育缺少同心协力，思想不一，没有群众力量。他要改革教育。他赞成杜威提出的道尔顿教制，启发学生思考，学生提问，

说
教师回答，不要~~死~~记式，不过全死记硬背，主
张讨论问题，回答问题。我认为他的提法是对
的，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
毕业回国后，他在北大教育系任副主任，
我由德国回来任担任欧美通史，欧美史学史，
后来又担任法学院美国宪法史的教学工作。

高仁山要我们“~~新中~~^{益文}学会”会员办一个
学校，于是就建立益文中学。没有地方就借用
北河沿，后来搬到灯市口，以后又搬到中山公
园西边（现在是二十八中）。高仁山为校长，董
良钊是董事长，一直到张作霖封了学校。我们
办益文中学，采用道尔顿制，反对灌输式的教
学方法，实行启发式，就以益文名声很好。1938
年1月28日，张作霖枪毙了高仁山，封闭了益
文中学。益文中学恢复后，由顾淑型任校长。

高仁山曾经拉我一块参加共产党，“我进行”，
（高仁山除在北大担任教育系副
主任、讲席外，他还当过扶清（水军部
部长）、邓超周厚湖。）

我们俩人一块去找李大钊同志。李大钊同志说，
“你们何必要进共产党”。高仁山说，“我要加入共
产党”，我说：“我没有关系，现在只愿国共合作”。
李大钊同志说：“你对了，我们就是要国民党
中搞工作”。李大钊介绍我和于树德加入国民党，
我拿了党证，我去过东城区党部一次，因为介
绍我的弟：陈克明到英培学校去学习。他是第
四期毕业生。

高仁山在1926年是市委执行委员会主席。

因为这个原因，1928年1月28日在天津被张作霖杀害了。

从1920年—1928年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在一起谈得来，我们都很直爽，有共同的事业心。

二、李大钊

我到北京大学工作后，因为新中学会的关系，与李大钊同志谈得来。他管党务工作，不上课了，日夜繁忙，我们不大见面，但他帮了我很多忙。李大钊同志介绍我认识苏联大使馆卡拉辛（个子很高，大鬍子）。文化参赞康托洛诺夫。康托洛诺夫会说英文。卡拉辛委托文化参赞和我办《国际通讯》，要我撰写英文稿。《国际通讯》用英、俄、德、法、西文发表。过了好久，李大钊同志对我说卡拉辛和康托洛诺夫要我替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，任务是收集情报。我说：“好吧！可以。”

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，李大钊问我“你与朱家骅好吗？”朱是北大教授，从德国留学回来，教地质，他与我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与朱家骅有一次在街上相遇，我与朱拿着旗子走在前面，当时北平洋区域有个第三国际工会要发救济棉衣（面粉、棉衣）。朱对我说，我们快去拿，要以他们的名义发救济，以我们国民党的名义发。我忍到好笑，虽然我并不是共产党，但我是为第三国际工作，偏：朱家骅要与共产党分家。朱家骅于1926年与陈友仁到广东去了，他创办中山大学，他打了二个电报要我走。我没有去。

1926年12月，陈友仁在汉口任外交部长。他打了一个电报要我与王士杰、周鯨生三人到

汉口，我们三人装作不相识的人，从天津乘了
通航，到了上海，去看了律师郑觐。第二天以后
又乘通航到了武汉，陈友仁要我们三人当外交
部顾问。不到二星期，李大钊打来电话，要我
赶快回北京。这件事给他们几人知道不好，于
是我说文母亲有病要我回去，两周后我就可以
回来。陈友仁说如。我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船上，
陈友仁的外交部就在水关上面，就这样我离开
了。李大钊救了我的命，我乘铁道回北京。4
月10日何应钦的军队进入上海，进行大屠杀。
新中学会会员安永搜也被何模^杀了。回北京后，
李大钊同志要我当心些，不要暴露身份。

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。我在北大历史系讲课，
主任是日本留学生名叫朱西祖。当时北大分两
部，一部是英、美、法，领导是胡适；另一部
是日、法，领导是李不曾（山西高阳人）。一派
明争暗斗，朱西祖任历史系主任后，不让我教
欧美通史和史学史，因为他要别人来任课，为
了把我撵掉，手段很巧妙，他递了一个名单（
班上十几个学生的名字），说陈翰民南方口音，
口音不清楚，讲课内容不会道，因此不配教外
国史。朱西祖把这份东西拿到评议会上去了，
评议会上蔡元培没有看到，蒋梦麟看到。高
仁山对我说：“你不是王士杰在搞《现代译论
》吗？你可去问王士杰”。王说：“这事真假如何，

我不知道，据我想是假的，如果去问签名的人，他们没有签名，岂不是把朱弄臭了。”王士杰要我与李大钊同志商量一下，看他是否有办法。李大钊同志对陶孟和讲，他想不出什么办法。南京东南大学要我去做教务长，我不愿做行政工作，没有同意。

李大钊同志帮助我解决困境。李勇对周颉生说：“王士杰这个人 是胡汉民的人，‘现代评论’是胡汉民生钱办的。”李大钊同志要我去找周颉生，说周是正人君子。周颉生对我很明，他说不用与王士杰讲，到法学系兼课教宪法史。（周颉生在北河沿法学院讲课），这样就把这件事解决了。我还是教授，我既能教宪法史，为什么不能教欧美史，史学史。李帮了我的忙，留北大）。

李大钊同志被捕前一天，在中东铁路办事处，苏联大使馆就在隔壁，由一个后门相通，随便来往，出入不要经过大门。我曾去看望他。大钊同志被捕是李石曾告密的。李石曾与军阀有来往，当时国民党、共产党争着拉冯玉祥和阎锡山下面开明的思想好的军官。李石曾和李大钊同志斗争很厉害。李石曾让张作霖疏通使领馆：葡萄牙公使，派七一下子将李大钊同志逮走了。

李大钊同志被捕后，给《奉天时报》与社

设的日本人中江丑吉送我们到天津，住在曹汝霖的房子，由天津去神户，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，便搭船到苏联的伯力，然后赴莫斯科。

三、张锡昌

无锡人，是由我的学生王芸生介绍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。后来到日本，又到苏联，36年到美国。卅年代张锡昌曾被捕过。当时徐鸣（建委外事局，长）告诉我，“张锡昌被捕了”。我打电报告诉吴克农，要他营救张锡昌。胡适认识军阀汤恩伯，不久张就放出来了。每年节日，张锡昌都来看我和胡适。1940-1941年在桂林办了工业合作运动，后来我到了印度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讲的是印度经济情况。1941年，他把这封讲述印度经济情况的信还给我，并说：“还是你留着它吧。”

张锡昌在党内做了许多工作，他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很好，他勤，无闻地工作，心地善良。张锡昌是我的朋友。

四 郭沫若

1933-1934 年在日本时由日本留学生总监介绍我认识的。郭沫若曾听刘贺连（在重庆当经济部长）谈过我，以为我是贺连的朋友。郭沫若对监督讲要我去看他，这样我们就相识了。我们谈得很投机，讨论奴隶社会。我告诉他中国史不行。他说：“谈外国”。郭多才多艺，知识渊博。他谈起甲骨文津津有味。那时我与顾叔型一块去看他。

过年时，郭沫若喝醉了，我也醉得不省人事，后来顾叔型喊了汽车把我送回去。

郭沫若很机警，1951-1955 年我们常见面，我与他一块参加二次世界和平大会（瑞典和东德），还一起到过莫斯科。那时候乘火车常在一起谈心。郭沫若不大和别人谈，但对我什么部谈，很直爽。他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，谁的干事给我们^尽是不中用的，我简直没有办法”。郭沫若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是自由主义者，与他差不多。在东京他把姬鹏飞批评得一塌糊涂。

明德中学的由来和主要人物

这是黄兴办的，宋教仁也是赞成的。何时创办不记得了。东林小学毕业后，我随母亲到长沙去读书。父亲在湖南兵备处（军官的预备处，即后补军官处）。辛亥革命时父亲是程潜部下的一名旅长（父亲在南昌陆军学校毕业，到汉军得道教过书，后来在贵阳办陆军学校。何应钦是他的学生，所以介绍他到财政部当官）。父亲带了一旅兵到武汉参加革命，到了岳州，没有往前走，因为汉口已祥和了，所以没有到湖北。

辛亥革命时，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不是大总统，只能是临时大总统？就是因为汉口革命时，宋教仁、黄兴、汪精卫与袁世凯讲和了，不打。原因是我们兵力不够，孙中山先生没有钱，在英国日本都借不到钱。袁世凯却能从英日处借到钱。孙中山无钱无兵，所以只能由袁世凯出来掌握局面。袁世凯把清皇帝废掉了，我们就让他为第一大总统。孙中山先生只做了临时大总统，天津有些国民党人就起义造反。袁世凯下面的人打电报到南京，“你们要知道，那些人在天津要革命，怎么办？”回答：“那不是我们的人”。于是袁世凯就把这部分国民党人全杀了。

在明德中学我听过黄兴演讲。黄个子不大，

很胖，脸是红的。黄兴是参加开办明德中学的。该校完全是私立的，发起人不知道。学校有一个匾，叫“坚苦奋斗”。胡子清是校长，他负责捐款，发起者是黄兴。胡校长是瘦的，声音大，长鬍子。与武训不一样，胡热心办学，谁不肯捐款，他就带了行李住在那里。这个人了不起，看到报纸允许私人办学，他就办私办学校，他请的教师都是有学问的。

傅熊湘

醴陵人，长得不高，戴西瓜皮帽子，后面有辫子。同学对我讲：“我们那天把他的辫子扯下来。”我不同意这样做。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，将辫子剪掉了，有一个圈将帽子戴上。

傅先生是诗人。他有我不是本地人，长得笨，特别喜欢我，常要我去他那里，对我很好。傅先生教中国历史课，他^{很慷慨地}批评曾国藩打太平天国，骂曾是满清的奴隶。他讲得好，我听得入神，于是我画了一个人，在脖子下又划了一把刀，意思是曾国藩砍头。这说明傅先生激发学生民族主义精神，要我们排除满清。当时我五体投地地崇拜他。

1911年因辛亥革命，停课了。傅先生是《长沙日报》的编辑主任。他把我当听差使用，

稿件我去拿，信件由我去发。那时，我想不到
学校去学习，我干报纸，作算数。后来我到雅礼
学校去了。

傅先生认识周先生。1924年我到北大教书，
他知道陈翰笙就是陈。傅先生对周先生讲，
陈是我的学生。1924年傅先生在农军团底下当
了醴陵县，长。1925年年底，我从北平到醴陵
去看他，他长矮火炉。他过去是革命的，深
影响我，后来完全成了官僚。